

工农群众是辛亥革命的基本动力

——与“动力集中”论商榷

裘 真

如何评述辛亥革命时期历史的主体和动力，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解放以来出版的有关著作，大都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编撰的，并且流行着一种“动力集中”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但提出了资本主义的革命理想，而且为实行革命，在一定程度内进行了对工人、农民力量的发动。因此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这时期是集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或者说：“二十世纪开头至辛亥革命……单纯的农民战争已经过去。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资产阶级不但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并且发动了实际的革命斗争。历史前进的动力是集中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当时没有其他社会力量能够卷起这股反满怒涛。”我们认为这种论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处于革命的领导地位，是革命的动力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是因此就可得出结论，动力集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呢？不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封建主义的束缚，在一定时期内有一定革命性；但它政治上、经济上都异常软弱，没有和帝、封势力完全断绝联系，具有严重的妥协性，“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把这样一个两面性的阶级说成是历史发展动力的“集中”者，显然是很不妥当的。

事实也是这样。辛亥革命时期，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根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挽救民族危亡。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受压迫最深，反抗也最坚决，是反帝、反封的主力军。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提出了革命纲领，却不敢公开举起反帝的旗帜，反封也很不彻底。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远远比不上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在反帝斗争中，资产阶级的拒俄运动与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沙俄的疯狂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抗。资产阶级革命派出版刊物，集会演说，组织拒俄义勇队，掀起拒俄爱国运动，在当时确曾起了推动人民觉醒的作用，有很大影响。然而，他们始终没有和东北人民并肩战斗过，却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中掌握军队的个别人物身上，结果被扣上“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的帽子，遭到取缔镇压。劳动人民却显然不同。他们比资产阶级更早地举起“御俄寇、复国土”的大旗，拿起武器，与沙俄侵

略军进行浴血奋战，打得侵略强盗闻风丧胆，“死伤以千百计”（《中外文献策论汇编》卷十八）。所谓“不畏中国之官兵，畏中国之‘贼匪’”（《海龙县志兵事》），就是东北人民抗俄斗争业绩的写照。在这次大规模抗俄斗争中，谁是主力，谁是反帝的广大动力，不是一清二楚么！

二十世纪初，人民群众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抗捐抗税斗争遍及全国，搞得清军“疲于奔命，防不胜防”。连清朝最高统治者也预感“‘盗’风增剧，将酿巨乱”（《宣统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上谕》）。反动统治面临严重危机。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则远不能和风起云涌的群众风暴相比。而且资产阶级自身发动的革命斗争，有群众积极参加的起义与单纯军事冒险的起义相比较，也显得一个声势浩大，震惊全国；一个则倏然而发，寂然而息。萍浏醴起义，是一次有工农和巡防士兵广泛参加的大起义，孙中山称之为同盟会“自动之义师”。其所以有那样大的规模和影响，正是因为同盟会员借助了这支蓄谋待发的造反队伍。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沿海沿边一带发动武装斗争，有时也接纳会党群众作为战斗队伍，但只是当作临时“招兵买马”的攻战之具。这些起义虽然连续发生，却都很快失败。黄花岗一役，是资产阶级发动的一次破釜沉舟式的起义，影响也很巨大，会党群众参加是一个重要因素。可是一经失败，就连黄兴这样的革命领导者，也黯然气息，甚至要亲身而行暗杀。怎么能说，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了动力集中者呢？！

“动力集中”论的根本错误是违背了奴隶们创造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劳动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任何阶级社会中，都是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不例外。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普鲁士“危机”》）列宁更明确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讲）解放运动，按动力来讲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这一运动的动力可能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什么可能这样呢？因为无产阶级和农民比资产阶级更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更需要自由，更需要消灭地主的压迫。”（《土地问题与革命力量》）列宁在评论辛亥革命时又说：“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毛主席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分析革命的动力时一再强调，农民特别是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新民主主义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这些深刻而明确的论断，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动力问题的科学结论。所谓“动力集中”论，显然是违背了这些科学结论的。

“集中”论的第二个错误是无视工农是革命的根本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谁是革命的动力，谁是革命的主力，“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农人口占绝大多数，受压迫剥削最深；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

矛盾最尖锐、最深刻、最不可调和，因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态度最坚决，最彻底；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动摇了和摧毁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因此，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只有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至于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被历史推上了革命领导阶级的地位，由于本身力量异常软弱，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却是一个无力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农民”（列宁：《政治家短评》）。资产阶级离开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根本不可能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历史表明，辛亥革命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始终是革命的主力军。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辛亥革命是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集中”论的第三个错误是忽视农民为基本队伍的劳动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把它看成消极力量。在辛亥革命时期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工农群众都是积极的发动者和参加者。他们的斗争愈发展、愈深入，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就愈大。资产阶级革命的胜败，取决于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人民群众冲破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克服其妥协性的程度。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才使得正在高涨的、工农群众进发的那个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遭到压抑和破坏，导致了辛亥革命仅仅取得赶跑了一个皇帝的成果而失败了。

二

人民群众是辛亥革命的基本动力，还是动力集中到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辛亥革命的历史作了最好的回答。

首先，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农民态度的转变，推动资产阶级迅速走上革命的道路。义和团运动前，改良主义思想在资产阶级中很有影响，后来，相当一部分人受到人民英勇斗争的鼓舞，逐渐由改良转向革命，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就是如此。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很快形成，人民群众斗争的推动起了很大作用。继义和团运动之后，其余部景廷宾举起“扫清灭洋”大旗坚持斗争，广西会党起义持续达三、四年，这些都给予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很大鼓舞，增强了他们革命的决心，坚定了他们推翻清朝统治的信心。资产阶级开始是反对和咒骂义和团的；后来，有些人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九〇一年刊行的《开智录》赞扬说：“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今虽败师逐北，溅血横尸，然其勇之一字，未尝不轰全球人之耳，电全球人之目也。……有此数功，则我国民精神可从此振刷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二十世纪初迅速发展，就是这种国民精神振刷的具体表现。席卷广西全省的大起义，更给孙中山以莫大的鼓舞。他看到人民斗争的巨大力量，充满信心地说：“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资产阶级由于看到人民群众斗争的巨大力量，对农民态度也由对立、敌视、反对，转而采取联合、利用。有些人开始注意利用会党的力量来开展革命斗争。光复会联络龙华会，华兴会联

络马福益，都是明显的例子。资产阶级革命是新的剥削阶级代替旧的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利用群众的力量，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但是，在农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没有被资产阶级看成有利于自身的斗争时，它是不会采取联合政策的。促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态度转变的，不是别的，正是由于农民显示了和正在显示着巨大的反帝、反封建力量。

其次，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涨，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进入高潮。二十世纪初，虽然没有出现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但是，人民群众分散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连绵不断，抗捐抗税，拒俄拒法，反英反美，收回利权等等，互相激荡，震动全国，造成民主革命高涨的形势。孙中山在一九〇四年非常兴奋地说：“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正是在人民斗争高涨的推动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策划统一革命组织。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大起义——萍浏醴起义，由于工农群众的踊跃参加和支持，才使得这次只有一、二个同盟会员参加的起义，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发动阶段进入高涨阶段的显明标志。辛亥革命前夕，人民反抗斗争如火如荼，一九〇九年有一百三十多次，一九一〇年达二百九十多次。这些广泛的群众斗争，奠定了武昌起义和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的坚实基础。单纯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决不能造成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高涨。

第三、人民群众是推翻清王朝的决定力量。清朝反动统治的覆灭，是两百多年来人民不断反抗，不断削弱其反动统治的结果。到了武昌起义前夕，由于人民反抗蜂起，清朝统治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境地，所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全国闻风响应，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统治立即分崩离析。在这最后决战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是领导者，人民群众则是决定力量。武昌起义前，以农民为主力的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斗争，加速了武昌起义的爆发，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武昌起义后，武汉地区人民踊跃参军参战，鄂北江湖会及时发动起义，川汉铁路工人及京山等地群众积极投入斗争，对保卫武汉的革命政权起了重大作用。四川、湖南、陕西、江西、广东、广西、福建、安徽、贵州、云南等省，以农民为主的下层群众迅速起来斗争，有力地推动了这些省份的独立，促进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一些尚未独立的省份，群众的自发斗争，牵制或打击了当地的反动势力，对革命也是一个有力的声援。席卷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起义，汇合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三次革命高潮，最后终于彻底埋葬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正如列宁所说的：“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第四、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度、广度和韧性都远远超过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二十世纪初，遍及全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形成了民主革命的巨大潮流，震撼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却远比不上人民群众提出“扫清灭洋”等口号，公开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农民却提出更彻底的反封建要求，龙华会在

章程中提出“要把田地改作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洪江会在起义檄文中宣布要“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均之社会。”这些都比核定地价，照价征税的“平均地权”主张激进得多。二十世纪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实际存在两个战场，一个是广阔的农村，资产阶级几乎没有扞手；一个是集中的城市，冲锋陷阵的仍然是劳动人民。人民群众不管面临多大困难，也不论斗争遭受多大损失，始终百折不挠，坚持斗争；资产阶级则一遇挫折，就动摇、退缩、灰心。他们对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充满恐惧心理，就连激进的邹容、陈天华，也把农民革命当作“野蛮革命”而加以斥责和反对。武昌起义以后，全国蓬勃兴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超出了资产阶级所容许的范围，他们害怕危及自身利益，把人民反抗斗争视为洪水猛兽，不惜向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妥协，终于断送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三

我们肯定人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化，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掀起高潮，在夺取革命胜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丝毫不意味着抹煞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期是一个革命阶级。它的登上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确是标志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正规地开始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是历史赋予它的任务，也是它的伟大历史功绩。这种历史地位不应否定，也是否定不了的。

但是，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者是一回事，把资产阶级的动力作用夸大到很不适当的程度，说成是动力的“集中”者，则是又一回事。资产阶级充当了革命的领导并不意味着历史发展的动力也集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领导和动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容混同。所谓领导，主要是指给革命指出了方向，确定革命的任务，提出革命的纲领和路线，制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等。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理想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这只能表明它担当起革命领导者的责任，并不能以此为根据，说明动力集中到它手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毛主席只说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从来没有说动力集中到了无产阶级手里；相反，却明确指出贫雇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中农“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尚且如此，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还能把历史发展的动力集中在它的革命派手里吗？

领导革命的阶级要夺取胜利，除了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和策略外，还必须团结一切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领导人民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辛亥革命中，作为领导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尽管向会党群众和新军做过一些工作，可算是“一定程度

内进行了对工人农民力量的发动”，但并没有和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结成同盟，没有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反而在高潮中摧残人民革命力量。即使发动了工农，也只能算是实现了领导者的责任，并不能说是动力集中到了它的手里，何况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发动工农上很差劲呢！

是不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已经过去”，就可说动力集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呢？我们认为这也是不对的。革命发展到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期，单纯的农民战争作为一个革命发展阶段是过去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却仍然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种基本动力作用不但旧民主主义时期没有过去，直到新民主主义时期也没有成为过去。农民等劳动群众之所以始终是基本动力，一是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二是受压迫受剥削最深重，所以反抗也最坚决。只要上述条件没有改变，它就始终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就不能说动力集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是不是工农群众作为资产阶级追随者参加革命，就可说资产阶级成为动力的集中者呢？也不能。在辛亥革命中，工农是追随者，指的是他们在革命中所处的地位；而动力作用，谈的是工农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辛亥革命时期，工农群众斗争遍及全国，从下到上，从农村到城市，从基础到上层建筑，无不给予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正如马克思评述法国革命中群众斗争作用时指出的，它“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国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怯弱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但是，这些广泛的群众斗争都是以自发斗争形式卷入辛亥革命洪流的，软弱的资产阶级不但没有去“集中”，而且对暴风雨般的群众斗争深怀恐惧，由害怕而限制，由限制而镇压，又怎么能说得上是工农动力作用的集中者呢？！不过，由于农民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工人阶级当时又还处在自在阶段，所以尽管他们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而“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见同上）

最后，还有一个所谓“时代中心”问题。据我们理解，所谓资产阶级当时是时代的中心，是指资产阶级代表着当时先进的生产方式；由于它的出现，决定着当时时代的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决定着时代的资本主义方向。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发展资本主义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建立相应的上层建筑——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不能说资产阶级成了时代的中心，历史发展的动力也集中到了它的手里。资产阶级能提出符合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而要实现这些要求，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仍然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斗争，就寸步难行。

“动力集中”论把资产阶级说成辛亥革命时期历史动力的集中者，实质上就是承认资产阶级是这一时期历史的主宰，全部辛亥革命史的创造主。这样，作为推动社会革命和生产发展的主体的工农群众被排挤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作用被抹煞了，辛亥革命史被颠倒了。到头来，还是续了帝王将相的家谱，落入了唯心史观的窠臼。